

| 十家论丛 |



司马琪 主编

十家论管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十家论丛 |

司马琪

主编

十家论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家论管/司马琪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十家论丛)

ISBN 978 - 7 - 208 - 07957 - 1

I. 十... II. 司... III. ①法家②管子—研究 IV. 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0609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十家论丛 ·

十 家 论 管

司马琪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34 插页 3 字数 515,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7957 - 1/K · 1459

定价 45.00 元

《十家论管》编辑小组

主 编：司马琪

副 主 编：李明东 关 桐 李 平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孔宝 卢明明 乔 伟 华 雪

李 曦 李春博 李毅强 杨宏声

汪逸珮 林道正 周秋芳 祝 捷

高洪兴 钱宝谨 程新国

办公室人员：孟葛平 钟志林

“十家论丛”总序

把根留住，让脉搏动，践迹力行

博大精深、理蕴醇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东濒太平洋的远东大陆，越来越显现出其“道法自然”、“自强不息”、“其命维新”的鲜活生命力。尤其是其中带有浓烈原初气息与创世意味的原典著述，经时代的沿革、社会的进步，它们已成为生长在这块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心中的民族历史之根、传统文化之脉、行为方式之迹。

据眼下已知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0年间，正是人类社会各文化圈的原典创制期。其时，与中华原典同时涌现的，还有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原典，联结欧、亚、非大陆的地中海区域的希腊原典和希伯来原典。它们分别展现着各自对地球上其他区域民族及后世人们的影响，成为了各具神态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的文化传统或文化遗产。

隋唐之后，度过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以家族为本位而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文化上出现过繁荣景象，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被世界看作是富庶之地的人间天堂，是一个管理得十分有序的国家，世界各地都有人前往观光，真心渴望从中华原典中寻找治国处世的良策。

此时的中华原典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千禧年前后，正处于“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赵宋王朝(960—1279)，人们对诞生于文化轴心时代的中华原典推崇达顶峰，尤其是将儒家的经典尊为“十三经”，并依据“心”、“性”之学将儒释道合为一体，创立了由南宋大学者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发展到明清之际，已越演越烈。然而，这同一时期，正是欧洲大陆的平民从久处的中世纪黑暗中挣脱着冲出来，经由复兴两希原典精神和高举“天赋人权”的启蒙反叛旗帜，跨进了掌握机械电能，以社会为本位而相对开放的工业文明时代，开始步入现代化的社会。于是欧洲大陆的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便出现了专门向外掠夺资源、扩展势力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大肆散布人类社会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论调。他们认为似乎只有两希原典中阐述的传统文化才与现代化有内在联系，才揭示

了人类生活的方向,才是人类智慧的唯一结晶。于是有人断言,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在现代化的门槛前“业已死亡”,并用不无讥讽的口吻说:“在产生它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藏着。”言下之意,世界各文化圈诞生的各大原典中,只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两希原典才有无限的活力,才是人类前行的真正依靠。

历史是生长的,文化是开放的,民族是建构的。仅凭人类历史长河某一瞬间时段所见(犹如一场体育比赛的小组赛)就散布狂言,成了不顾事实的妄语,而让人耻笑。

对于深受“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教诲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恪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古训的践行者。在实际生活中是敢于向先进学习的。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中华大地出现了反叛传统的思潮,希图用西方社会业已见成效的思维,对始终影响着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批判、否定甚至遗弃的极端举措。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迎合世界工业文明的潮流,才能抓住现代化的风标,才能振兴中华。他们在抗争、冲击、颠覆中华原典的负面影响之时,将原典的合理内核也一锅端了,这样做势将斫伤民根、中断文脉、翦灭行踪,这是十分可怕的!

自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对时称“国学”中的原初、根本、创世的中华原典进行研读、反思。他们不只从中华原典精神中看到光明,而且在现代化进程迅猛的西方社会闻到腐臭。他们不再奉原典为主臬,而是以“不耻下问”、“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精神,在汲取了两希原典精神的精髓之时,力求在一味颂扬中华原典精神或肆意诋毁中华原典价值的正反两个极端之中寻找会通整合之道。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的诗句,正是反叛传统和整合传统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只是后者对蕴含着中华民根、文脉、行踪的原典精神更注重的是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让这诞生于“轴心时代”多元文化传统中的一支,在今天多元格局的世界,不无自傲地向世人展示它的鲜活风采、强劲生命和无穷魅力。

人们都已知晓,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化有种“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的大手笔,其中隐藏着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源于掠夺、扩张的两次规模空前的大战,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系统崩溃、大气臭氧层变薄、动植

物物种减少、细菌的无规则变异等等,无不向人类的生存发出警告。鉴于人类和自然界所处的相互抵触的尴尬困境,世人又一次把目光转注到了中华原典。

在新世纪曙光普照下,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二个千禧之年,也开始进入一切尚待认知的以自然为本位的信息文明时代,而这正可以说是一个践行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时代。世界上多元文化原典精神的共生共存,特别是中华原典所阐明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和谐原则,“求融通、致中和”的思想则成了当今人们认识并治疗“现代文明病”的救世良方中主要一味良药。恰如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所说的:“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中西学者将中华原典精神和两希原典精神以及其他民族的智慧会通整合的举措,是将全人类的智慧凝聚的明智选择。这样既能使原典走出囿于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资源,以克服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又能结束现代化在“带给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的古典意义上的悲剧。

鉴于上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思考和这样的寻绎,我们觉得有必要将20世纪中对中华原典中的《易经》、《老子》、孔学、《墨子》、《庄子》、《管子》、《孙子兵法》以及中国化的佛学等经过会通整合的研究之作,各选取十位有独到见解又有中西学术根柢的大家著述中的主要内容,辑为《十家论易》、《十家论老》、《十家论孔》、《十家论墨》、《十家论庄》、《十家论管》、《十家论孙》、《十家论佛》,看看大家是怎样照着前人的诠释来理解的,又是如何接着前人的解说来研究的,以便令后人更自信地在智山慧海的真火中,“愿随前薪作后薪”,在“照着讲”、“接着讲”中华传统文化中,传承中华原典的文化基因,让中华原典中富含的人类睿智的宝藏,能在对人类生存充满鲜活解说的同时,又对现代世界及未来世界的重要问题,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能更从容地站在全球文化交流激荡的时代高度大力发掘;让中华原典中凝聚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不断蜕变过程中,经过“万物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诚如《诗经》所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我们冀盼着。

“十家论丛”编委会

于2006年6月10日

第一届文化遗产日

“十家论丛”编例说明

为了便于现今和未来国内外学人了解和研究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研究百家争鸣的历程及其成果,特从近百年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中编辑并在此基础上以专题的形式出版一系列近现代名家学术论著汇编。每次都选十位学者或学派对某一专题的研究论著作为一集,所以名为“十家论丛”。该论丛第一辑包括以下八种:《十家论易》、《十家论老》、《十家论孔》、《十家论墨》、《十家论庄》、《十家论管》、《十家论孙》、《十家论佛》。论丛编例如下:

(一)“十家论丛”的每一种名为十家,每家选录一位学者或观点相同一派学者的论著。选录的标准是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术特色,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著。凡在学术论战中比较重要的论著均优先选用。

(二)“十家”的编排,一般以各家就这一专题发表的先后为序,每一家或每一学派的论著也以发表的先后为序。凡选入的论著,除篇幅过大有所删节外,一律原文照排,只是根据现行标点规则加以统一,繁体字改排简体字(个别例外)。

(三)“十家论丛”具有文献保存的性质。因此我们不主张作者对被选入“论丛”的论著进行修改,如果另行写出“修正”或“说明”,“论丛”将予刊载;对原作进行的技术性修改,也加以注明。

(四)被选作者一生的学术观点可能前后有变化,甚至有重大变化,有的作者对其当年的学术观点已经改变,但有关论著在当时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在该学者一生学术研究历程中也有重要意义,为保存历史本来面目,也按原貌选入。

(五)选录标准以点面结合为原则,尽量精选,每册50万字左右。

(六)每册序言或每家的序言,一般只对作者生平、学术背景及论著的基本内容作简单介绍性说明,以供读者参考。

“十家论丛”编委会

《十家论管》编纂说明

《十家论管》选辑百年来管子研究者梁启超(1873—1929)、罗根泽(1900—1960)、俞寰澄(1881—1967)、黄汉(1936年出版专著)、马非百(1896—1984)、胡寄窗(1903—1993)、冯友兰(1895—1990)、关锋(1921—2005)、巫宝三(1905—1999)、王德敏(1937—2000)关于管子的论著汇编一册,以供读者了解20世纪关于管子研究的各种观点。编文的次序,基本上按照各家专著的问世时间之先后排列。

管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人物,但长期以来管子和《管子》书的研究一起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其原因与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有关,也与《管子》书的散佚、流失和晋唐人疑之为“伪书”有关。宋人苏辙也说《管子》书“非管子之正”,其影响尤大。管子和《管子》书的研究处于被冷落状态,与这种误解有很大关系。迨至晚清,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始有学者认真从管子和《管子》书中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张履、薛福成并认为“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在这种背景下,维新运动的理论家梁启超乃下功夫研究管子和《管子》书,并在公元1909年写成《管子传》,这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用近代思维研究管子的著作,所以《十家论管》将其书列为本编首选之作。

梁启超的《管子传》在当时是学术界一件新鲜事,许多人由此对管子发生兴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注意了这件事,并对梁启超《管子传》所依据的《管子》书的真伪问题有大胆的假设。回国后,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胡适书话》中,针对梁启超的《管子传》批评说:《管子》乃是后人把一些儒家、道家等的议论并作一书,绝非“齐稷下诸生衍管子余绪之作”。胡适的这一批评虽然只有短短几十个字,但此论一出,响应者迭出。傅斯年即谓“《管子》书没有一个字是管子写的,最早不过是战国中年的著作,其中恐怕有好些是汉朝的东西”(见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1931年罗

根泽著《管子探源》，对胡、傅的大胆的假设作了小心的求证，其结果是《管子》现存 76 篇中，46 篇为战国作品、30 篇为秦汉作品。《十家论管》选辑此书作为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作，将其列为《十家论管》的第二种。

20 世纪 40 年代有两本专门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一是 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汉著《管子经济思想》；其二是 1944 年温州中华印刷厂出版的俞寰澄著《管子之统制经济》。这是突破当时管子研究中书的真伪、年代等问题，而进入管子经济思想实质性研究的著作，虽然他们的观点未必都准确无误，但在管子研究中实属开创性的作品，所以本书编者将他们的著作列入十家之选的第三、四种。

1943 年又有马非百对《管子》书的《轻重篇》作批评考证。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他提出《管子》书的《轻重篇》乃出于西汉末年的王莽时代。除此之外，马非百还着重分析了《轻重篇》的经济理论体系，并对各家对《管子·轻重篇》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马非百的研究成果主要部分在 1956—1957 年先后发表于《历史研究》杂志，他的研究受到郭沫若的重视。郭沫若编著的《管子集校》引证他的考证有近百条之多。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马非百七易其稿的《管子轻重篇新诠》。马非百此书被学术界公认为近年来管子和《管子》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作品。本编因此将其列为《十家论管》之第五种。

郭沫若《管子集校》和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管子和《管子》书的研究已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题目。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从 1961 年开始出版的大部头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又设专门篇章对管子和《管子》书中的经济思想作系统研究。他认为《管子》一书三分之二以上涉及经济问题，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此书的基本经济概念的奠基者是管仲，到战国中期形成以管子经济思想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体系，在先秦经济思想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胡寄窗还运用近代相关经济理论对管子经济思想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胡寄窗对管子和《管子》书经济思想的研究，是管子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成就。本编将其论著列为《十家论管》之第六种。

哲学家冯友兰和关锋在 20 世纪的 50—60 年代都从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思想角度研究过管子和《管子》书。

冯友兰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中，曾简单论述过

管子,50—60年代,他开始用新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改写《中国哲学史》,在此过程中他也改写了管子部分。70—80年代,他再次改写《中国哲学史》,并陆续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新编》对管子的分析中,既肯定了管子在齐国的改革(如对废除分封制和“相地衰征”改革)的历史进步意义,也分析了管子对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他特别强调管子富国强兵政策,肯定管子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变时期的改革、进步路线的创始人。

关锋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了管子和《管子》书。他发表于《春秋哲学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中的《管仲哲学思想研究》和《管仲遗著考》,是当时管子和《管子》书研究中受到中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著作。关锋认为,管子是站在新兴阶级立场上主张奴隶解放,主张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政治家,也是创立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家。当然关锋也认识到管子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有旧东西的残余,对周礼的亲亲制度亦缺乏批判。这种不彻底性影响了齐国后来的发展。

关锋的《管仲遗著考》对《管子》书的编定和流传作了考证。他确定《经言》各篇和《外言》中的《五辅》基本上是管子的遗著,但不否定其中有后人掺入成分,《外言》其余各篇和《内言》各篇是管子思想和行事的记录,而且是信实可靠的。关锋的《管仲遗著考》,还针对疑古派为否定《管子》书与管子有著作关系,而提出的两个公例(即战国前无私人著作;战国前“於”字不作介词)作了详尽考证,认为这两个公例都是不能成立的。

冯友兰和关锋的论著分别列入《十家论管》的第七种和第八种。

20世纪80—90年代,管子和《管子》书的研究逐渐摆脱过去被冷落状态,而进入热闹阶段。继郭沫若的《管子集校》,各种注释本不断出现,各种研究专著(包括日本、欧美的译作)亦陆续出版。两者数量达几十种之多。这还不包括山东《管子学刊》和各地报刊发表的关于管子研究的论文。我们从这二十年的各种论著中选了有两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编入本书。

一本是巫宝三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巫宝三是一位资深经济思想理论家,著作甚丰。为了让读者了解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编者请山东管子学会于孔宝著文对他的学术研究和《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了专门

4 十家论管

介绍。巫宝三的管子研究专著选辑,列入《十家论管》第九种。

一本是王德敏的《管子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另附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1年第三期的论文《管仲思想对老子道德论的影响》。王德敏的管子论著选辑列入《十家论管》第十种。王德敏是山东《管子学刊》的主要创始人,1982年曾策划组织全国第一届管子学术讨论会。他对管子的研究亦有一定深度,可惜英年早逝。本书编者仅在这里对他多年来为开展管子研究所作的贡献表示敬意。

鉴于管子毕竟不如老、孔、孙、墨为人们所熟悉,所以编者将司马琪撰写的《管子评传》附于书末,以供读者参考。

目 录

《十家论管》编纂说明	1
梁启超论管子	1
罗根泽论管子	57
俞寰澄论管子	103
黄汉论管子	161
马非百论管子	223
胡寄窗论管子	259
冯友兰论管子	307
关锋论管子	321
巫宝三论管子	407
王德敏论管子	471
附录 管子评传	511

梁启超论管子

目 次

评梁启超的《管子传》.....	司马琪	2
管子传(摘录).....		6
自序.....		6
第一章 叙论.....		6
第二章 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		8
第三章 管子之微时及齐国前此之形势(略).....		9
第四章 管子之爱国心及其返国(略).....		9
第五章 管子之初政(略).....		9
第六章 管子之法治主义.....		9
第七章 管子之官僚政治(略).....		20
第八章 管子之官制(略).....		20
第九章 管子内政之条目.....		20
第十章 管子之教育.....		22
第十一章 管子之经济政策.....		23
第十二章 管子之外交.....		51
第十三章 管子之军政.....		52

评梁启超的《管子传》

· 司马琪 ·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政治家、学者,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公元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力主变法国强。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又在湖南长沙办时务学堂,鼓吹维新运动。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被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后,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受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抨击。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政府司法部长。1916年支持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

梁启超在晚年从事学术著述,在清华学校讲学,著述涉及文、史、哲、经各领域,多有卓见远识,堪称中国文化的大师级人物。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夕,曾研究过春秋时代大政治家管仲(?—公元前645年)在齐国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事迹,并于1909年7月写成《管子传》一书,这本传记实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用新思维研究管子的第一部著作。

梁启超的《管子传》共分十三章,六万余言。该书从管子出身及时代背景说起,全面评述了管子一生,并重点分析了管子的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梁启超是从孔子以后,第一个称颂管仲为“伟人”,并把他和历史上著名的法家商鞅和政治家王安石并称为“最大的改革家”的学者。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认为,《史记》中关于管子的记载太少,欲了解管子,须读诸子书中的《管子》。《管子》书中虽有大量战国时人依托之言,但其中《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篇,司马迁都称述过,并不是伪书。“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

梁启超《管子传》发表以后,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针对《管子传》，反对认为《管子》为管子所作，他认为《管子》“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儒家的议论和一些道家的议论，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绝非“齐稷下诸生衍管子绪余之作”。1922年梁启超看了胡适的批评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又认为《管子书》的“小部分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但他对管子的基本评价并没有改变。

在《管子传》中，梁启超对管子之“为法治国”的“法治主义”评价很高。他认为“今世之立宪国家”均为“法治国”，“世界将来之政治，其能有更好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舍法以为治”，别无他法。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揭橥“为法治国”，“成一家言”，“薪尽火传以迄于今者”，则唯管子。

有人批评管子说：“今世立宪国之言法治，凡以限制君权，而管子之言法治，乃务增益君权。”梁启超认为这是因为今古社会情况不同，古代贵族专政，政出多门，主权不统一。对贵族专横，不以君权加以制服，则国亡。管子之“张君权”，“实张之以压制贵族”。虽然如此，管子仍主张君主亦“当受制于法，然后法治之本原立”。管子所说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等，均为“法所以限君权”之主张。管子曾主张学习黄帝“立明台之议”，学习大禹“立谏鼓于朝”。这些设施“尤与今世国会极相近”。齐桓公欲“效而为之”设“啧室议”，虽其实情不可考，但管子以人民监督政府为“神圣而不可侵犯”，其尊民权之精神与今世立宪政治相符合。所以梁启超认为不可把管子与商鞅“同视”。他认为管、商形同而实反、商鞅以法治为目的，“治标而不治本”。管子以法治为手段，以法治达到“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梁启超认为管子虽尊法治，而不废礼治，这是理想的治国之道，其思想高度超越了商鞅等人。

梁启超的《管子传》还详尽地分析了管子的经济政策。他认为管子是古代“大理财家”。但其理财，“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因为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国家财政才会随之而好，后世的自比于管子的理财家桑弘羊、孔仅等“非知管子者也”。

梁启超说：“管子为政之本，首在富民。”因为“民贫则散亡不能禁；民

贫则教育不能施；民贫则法令不能行”。《管子》书中“倡明此义者，屡见不一”。

梁启超积极评价管子之奖励生产政策。管子不仅重视农业，而且重视工商业，他帮助齐桓公组织盐铁生产，并利用金融货币调节市场供求，从而振兴了齐国的经济，使偏处中原东方一隅的落后邦国成为春秋时代称雄中原的霸主。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还用很大的篇幅积极评价管子的调剂经济分配政策。他说：“今世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其实“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管子即言“贫富无度则失”。“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之不齐也。”国家的任务即在“均羨(余)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不注重分配，光注重生产，只强调“强本趣耕”不调剂分配，“恶能以为治乎！”

梁启超说：“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借，而民且滋病……今世欧美泰西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管子利用国家之力量调剂粮食，调剂物价，调剂货币，调剂利息，限制豪强富商，匡济平民百姓，卒成齐国之治。

在《管子传》中，梁启超甚至抨击欧美之“商业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梁启超说：“近世有所谓卡特尔者(Kertell)，有所谓托拉斯者(Trust)，于最近一二十年间，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于是乎，有所谓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国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其说虽非可遂行今日，然欲为根本救治，舍此盖无术也。而此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可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言论，竟能出现于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即十月革命)前的八年，他的批判卡特尔、托拉斯的言论，也早于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论》出现前的八年。在清代末年，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旧派思想家竟能一反视社会主义学说为洪水猛兽之潮流，客观地给社会主义学说以积极的评价，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也是一件大事。